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關於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二年 • 莫斯科

關於「星」與「列寧格拉」兩雜誌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八月十四日決議摘要

☆

關於話劇院劇目及其改善辦法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決議

☆

關於「偉大生活」影片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九月四日決議

☆

關於穆拉得里的「偉大友誼」歌劇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八年

二月十日決議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二年。莫斯科

譯 平 亞
校 浩 昌

內 容

關於「星」與「列寧格拉」兩雜誌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決議摘要 5

關於話劇院劇目及其改善辦法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

日決議 13

關於「偉大生活」影片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

決議 23

關於穆拉得里的「偉大友誼」歌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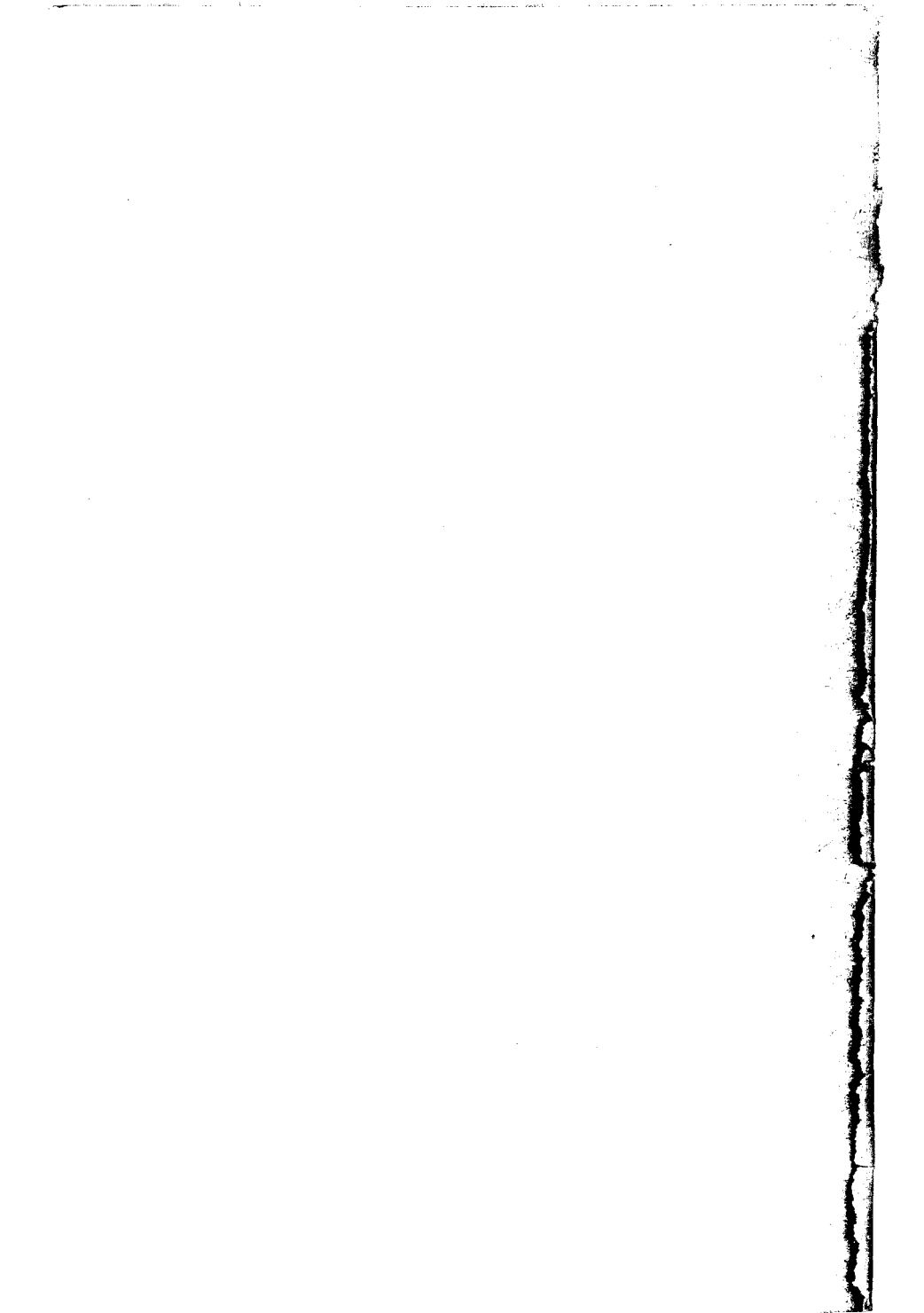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決議 31

關於「星」與「列寧格拉」兩雜誌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八月十四日決議摘要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指出，在列寧格拉出版的「星」與「列寧格拉」兩文藝雜誌的工作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

近來在「星」雜誌上，除登載有蘇維埃作家頗有意義的優良作品而外，還出現了许多沒有思想原則的、在思想上有害的作品。「星」雜誌的嚴重錯誤，就是它把文學論壇供給一個其作品是與蘇維埃文學背道而馳的作家左琴科來發表言論。「星」雜誌編輯部知道，左琴科早已就在專門寫作一些空洞的、毫無內容的、鄙陋的作品，專門鼓吹腐敗的無思想性、庸俗性和不問政治習氣，爲的是要迷惑我國青年和敗壞他們的意識。最近公佈的左琴科一篇小說「猴子歷險記」（載於「星」雜誌一九四六年第五六兩期合刊上），乃是對蘇維埃生活和對蘇聯人民作出的一種鄙陋的譏諷。左琴科用畸形的諷刺畫方式來描繪蘇維埃秩序和蘇維埃國人，將蘇維埃國人誹謗成爲一種原始的、不開通的、愚蠢的、帶着庸俗趣味和庸俗風尚的人。左琴科一面惡毒無賴地描繪我國實際生活，同時又發出反蘇維埃的攻訐言論。

其所以更加不能容許把「星」雜誌篇幅供給如像左琴科這種文學界的鄙子和敗類去發表作品，還由於以下的原因：「星」雜誌編輯部明明知道左琴科底面貌以及他

在戰時的鄙陋行爲，當時他絲毫沒有幫助蘇聯人民去反對德寇，反而寫作了如「日出之前」這樣一部可惡的作品；至於對這一作品的估量以及對左琴科全部文學「創作」的估量，都是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登載過的。

同時，「星」雜誌還極力宣傳女作家阿赫馬托娃的作品，而這位女作家底文學面貌和社會政治面貌是蘇維埃輿論界早已就熟悉的。阿赫馬托娃是與我國人民格格不入的那種空洞而無思想內容的詩歌底典型代表。她的詩篇滲透了悲觀主義和頹喪情緒，體現着那停滯於資產階級一貴族的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立場，即「爲藝術而藝術」的立場而不願與本國人民齊肩併進的舊時沙龍詩歌風味。她的這種詩篇，對教育我國青年一事有着極大的危害，因而在蘇維埃文學中是決不能容忍的。

讓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在該雜誌上起積極作用，這無疑是把離散思想和瓦解組織的因素帶進到了列寧格拉的作家中。該雜誌上，開始出現那種培植非蘇維埃國人所固有的崇拜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文化的心理的著作，開始發表充滿憂鬱心情、悲觀主義和對生活表示失望的作品（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上所載沙多菲也夫和科米沙洛娃兩人底詩歌及其他）。編輯部既登載了這些作品，就更加深了自己的錯誤，更降低了該雜誌底思想水準。

編輯部既在該雜誌上發表思想上異己的作品，也就降低了對所載文學作品之藝術質量的嚴正要求。該雜誌上充滿了藝術價值很低的各種劇本和短篇小說（如雅格得費

爾德的「時間之路」，史騰的「天鵝湖」等等）。在選擇刊載材料時的這種不分皂白的態度，遂使該雜誌底藝術水準降低了下去。

中央委員會指出，「列寧格拉」雜誌的工作做得特別壞，它經常讓左琴科在自己篇幅上發表鄙陋的譏諷言論，經常讓阿赫馬托娃發表空洞而不問政治的詩篇。也如「星」雜誌編輯部一樣，「列寧格拉」雜誌編輯部刊載了許多對任何外國事物都表示崇拜的作品，因而犯了重大的錯誤。該雜誌上發表過好幾篇謬誤的作品（如瓦爾薩夫斯基和列斯特合著的「柏林上空的故事」，斯洛尼姆斯基的「在一個關卡上」）。在哈真所著的「奧涅金歸來」一詩中，藉文學諷刺體裁，譏諷了現今的列寧格拉。「列寧格拉」雜誌上所登載的，大都是毫無內容的低劣文學作品。

試問，在列寧格拉這個素以先進革命傳統馳名於世的英雄城市內，在這個向來都是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策源地的城市內出版的「星」雜誌和「列寧格拉」雜誌，怎麼會讓人把這些與蘇維埃文學格格不相入的無思想性和不問政治的作品偷運進來了呢？

究竟「星」雜誌和「列寧格拉」雜誌兩編輯部所犯那些錯誤底意義何在呢？

該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首先是它們的編輯沙揚諾夫和里哈列夫兩同志，忘記了列寧主義底如下一個原理，即我國的雜誌，無論是科學雜誌或文藝雜誌，都不能採取不問政治的態度。他們忘記了，我國的雜誌是蘇維埃國家在教育蘇維埃國人和特別是在教育青年這事業上的強有力

的工具，因此，我國的雜誌應該以蘇維埃制度底生命基礎即蘇維埃國家政策爲指南。蘇維埃制度決不能容許用對蘇維埃政策漠不關心的態度，用無思想原則與蔑視一切的態度來教育青年。

蘇維埃文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學，它的力量就在於它除了人民利益而外，除了國家利益而外，再沒有而且不能有其他的利益。蘇維埃文學底任務，就在於幫助國家來正確地教育青年，滿足青年底需求，把新起的一代人培養成爲精神煥發、確信自己事業、不怕障礙並決心克服任何障礙的人物。

所以，任何鼓吹無思想性、鼓吹不問政治態度、鼓吹「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都是與蘇維埃文學格格不入，都是對蘇聯人民和蘇維埃國家底利益極端有害的，因而在我們雜誌上決不能有這種作品存在的餘地。

由於「星」雜誌和「列寧格拉」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底思想性不夠，也使這些工作人不是把對蘇維埃國人進行正確教育及保證文學家在活動上有正確政治方針這點作爲對待文學家的原則，而是把私人利益與朋友交情作爲對待文學家的原則。因不願破壞朋友交情而使批評鈍化起來。因害怕得罪朋友而讓顯係惡劣的作品在刊物上登載出來。這種爲保全朋友關係而犧牲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犧牲正確教育我國青年事業的利益，並使批評被壓倒下去的自由主義，結果就弄得作家們再也不求深造，喪失掉自己對人民、對國家、對黨所應負有的責任感，而停止向前發展。

上述這一切都證明「星」雜誌和「列寧格拉」雜誌底編輯部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並在對各該雜誌的領導方面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委員會確認，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包括它的主席吉洪諾夫同志在內，未曾採取任何辦法去改善「星」雜誌和「列寧格拉」雜誌底工作，他們不僅沒有同左琴科、阿赫馬托娃及和他們相類似的非蘇維埃作家對蘇維埃文學所起的有害影響作鬥爭，反而甚至縱容與蘇維埃文學格格不相入的傾向和習尚侵入到這兩種雜誌的篇幅中來。

聯共（布）列寧格拉市委忽略了這兩種雜誌所犯的重大錯誤，放棄了對這兩種雜誌的領導，而讓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這班與蘇維埃文學格格不入的人們得有機會在這兩種雜誌中佔居領導地位。不僅如此，列寧格拉市委（卡普斯庭和施洛科夫兩同志）雖已知道黨對左琴科及其「創作」所持的態度，但却越權地用市委本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決議，批准了有左琴科參加的「星」雜誌新編輯委員會委員的名單。列寧格拉市委因而也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列寧格拉真理」報也犯了錯誤，因為它在今年七月六日的一期上，登載了格爾曼那篇極力頌揚左琴科作品的可疑的論評。

聯共（布）中央宣傳局對於在列寧格拉出版的這兩種雜誌底工作沒有保證應有的監督。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決議：

（一）責成「星」雜誌編輯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宣傳局採取辦法，來無條件地消

除本決議中所指出的該雜誌底錯誤和缺點，糾正該雜誌底路線，終止在該雜誌上登載左琴科、阿赫馬托娃以及與他們相類似的作家底作品，以保證該雜誌有高度的思想水準和藝術水準。

（二）由於目前在列寧格拉沒有出版兩種文藝雜誌的相當條件，決定「列寧格拉」雜誌停刊，把列寧格拉文學界的力量集中在「星」雜誌周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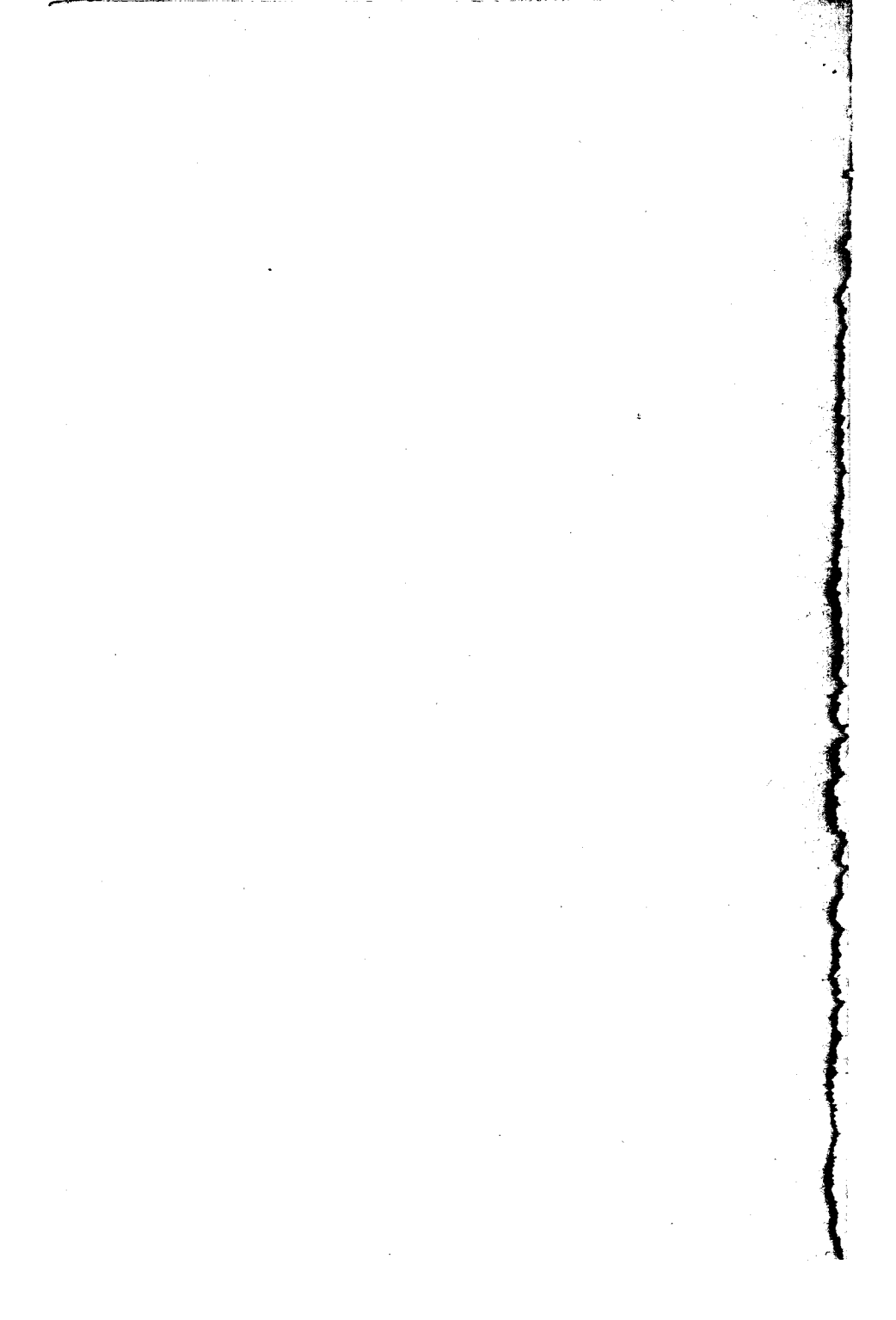
（三）為確立「星」雜誌編輯部工作中的必要秩序和認真改善該雜誌底內容起見，決定該雜誌有一個總編輯，總編輯下設立編輯委員會。規定總編輯應對該雜誌底思想政治方向及雜誌上所登作品底質量負完全責任。

（四）批准葉哥林同志為「星」雜誌總編輯，同時保留他所擔負的聯共（布）中央宣傳局副局長的職務。

關於話劇院劇目及其改善辦法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決議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在討論了關於話劇院劇目及其改善辦法的問題之後，認為話劇院劇目的現狀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話劇院劇目現狀中的主要缺點，就在於蘇維埃作家用現代主題編的劇本，實際上已從國內各巨大話劇院劇目中被排擠出去。在下列話劇院現今上演的劇本中描述近代蘇維埃生活主題的，只有極少一部分劇本，如莫斯科藝術戲院二十部劇本中只有三部，小戲院二十部劇本中只有三部，「莫斯科蘇維埃」戲院九部劇本中只有兩部，瓦赫坦哥夫戲院十部劇本中只有兩部，加美爾戲院十一部劇本中只有三部，列寧格拉普希金戲院十部劇本中只有兩部，基也輔城弗蘭科話劇院十一部劇本中只有三部，哈爾科夫城舍夫琴科戲院十一部劇本中只有兩部，斯維爾德洛夫城話劇院十七部劇本中只有五部。

使劇目方面的顯然反常狀態更為加深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些戲院內上演的很少幾部用近代生活作為主題的劇本中，還有膚淺平淡、毫無思想內容的劇本（如沃多萍楊諾夫和拉普節夫著的「被迫着陸」，土爾兄弟著的「生日」，雷巴克和沙福琴科著的「飛機延誤一晝夜」，格拉德

科夫著的「新年之夜」，士爾兄弟著的「緊急法令」，拉赫曼諾夫和雷斯著的「森林中的窗戶」，波哥金著的「女划手」及其他劇本）。在這類劇本中，照例是把蘇維埃國人描述成爲滑稽可笑的畸形兒，描寫成爲原始的、不開通的、帶有庸俗嗜好和庸俗習氣的人物，而對那些壞人物則賦以更鮮明的特性，把他們表演成雄強、剛毅而聰穎的人物。這些劇本中的情節，往往都是故意捏造，謬誤百出，因而這類劇本就對蘇聯生活造出一種不正確的，歪曲的概念。各戲院上演的用現代生活作爲主題的戲劇中，有頗大一部分是很原始的 and 反藝術的，寫作得極粗枝大葉，半通不通，表明出作者對俄國文學語言和民衆語言只是一知半解。加之，許多戲院在排演這些描繪蘇維埃生活的劇本時又缺乏責任心。戲院領導者往往把這種劇本委託給次等導演員去指導，並吸收能力薄弱和經驗缺乏的演員來表演，而對該戲劇上演時的藝術裝飾又不予以必要的注意，使得用近代生活作爲主題的戲劇膚淺平淡，很少帶有藝術性。結果就使許多話劇院實際上不成其爲培植文化和培植先進蘇維埃思想體系及道德的園地。話劇院劇目方面的這種情況不能符合教育勞動羣衆的任務，因而是蘇聯戲院中所決不容許的現象。

藝術事宜委員會和各話劇院活動中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他們過分熱中於排演用歷史材料作爲主題的劇本。現時在各戲院上演的許多沒有任何歷史意義和教育意義的劇本中，把君王、可汗和貴族的生活理想化起來（如斯克里布著的「納瓦爾女王瑪爾加里特的軼事」，舒古洛夫著